

## 壹、前言

電子治理 (e-governance) 將過去的電子化政府 (e-government) 及日漸受到重視的電子化民主 (e-democracy) 等兩個概念加以整合，用以表示資通訊科技在公共部門所產生的整體影響 (Backus, 2001; Chadwick, 2003; Lee, Chang, & Berry, 2011)。由效率的角度出發，電子化政府主要強調政府如何利用網際網路互動的運作方式來簡化並改善政府運作的流程；由民主的角度出發，電子化民主則著重在如何利用資通訊科技來鼓勵民眾與政府進行互動 (Backus, 2001; Lee et al., 2011)。過往許多有關電子治理的研究皆發現，利用資通訊科技做為治理的工具，確實能提升政府的效率 (Fountain, 2001; Moon & Norris, 2005; Shareef, Kumar, Kumar, & Dwivedi, 2011; Srivastava & Teo, 2007)、改善政府服務的品質 (Wong & Welch, 2004)、增加政府的透明度並減少政府電子治理的風險 (Armstrong, 2011; Bertort, Jaeger, & Grimes, 2001; Cho & Choi, 2004)，同時也增加民主化的程度 (Palvia & Sharma, 2007; Von Haldenwang, 2004)。

由上述可知，電子治理對於政府治理的良善有著關鍵的重要性。因此，許多國際發展組織與學術研究報告都明顯指出，電子治理已經成為一個全球性的現象，幾乎世界各國的政府都在推行電子治理相關的計畫與方案，用以創造增進公民參與的有利環境 (Singh, Das, & Joseph, 2007; Srivastava & Teo, 2007, 2008; United Nations Public Administration Programme, 2010; West, 2004, 2007)。然而，亦有許多研究發現，當較具創新能力的國家導入更先進的工具進入電子治理時，仍然有許多經濟發展轉型中或發展中的國家 (transiting economies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在電子治理的成熟或發展程度是較緩慢的 (Layne & Lee, 2001; Norris, 2001; Singh et al., 2007; United Nations Public Administration Programme, 2010; West, 2007)。對這些經濟發展轉型中或發展中的國家而言，電子治理的措施或工具僅僅做為政府內部與外部溝通互動的一個備選管道，並非是主要的管道，而且許多的研究與報告都顯示，這些國家電子治理的發展程度大多較為落後 (Information for Development Programme, 2002; United Nations Public Administration Programme, 2010)。因此，許多的研究便將其焦點放在這些經濟發展轉型中或發展中的國家，並針對各國政府在電子治理的發展進行比較與探討 (Boyer-Wright & Kotterman, 2008; Chen, Chen, Huang, & Ching, 2006; Gupta, Dsgupta, & Gupta, 2008; Holliday, 2002; Katchanovski & La Porte, 2005; Schuppan, 2009; Searson & Johnson, 2010; Sharma, 2007; Siau & Long, 2006;

Spremić, Šimurina, Jaković, & Ivanov, 2009; Wong & Welch, 2004)。

當然，除了上述針對經濟發展轉型中或發展中國家的研究外，由於電子治理的發展日漸受到世界各國關注，學術界也逐漸出現一些針對全球各國電子治理發展的研究（Dunleavy, Margetts, Bastow, & Tinkler, 2003; Hargittai, 1999; Kiiski & Pohjola, 2002; Lee et al., 2011; Moon, Welch, & Wong, 2005; Rose, 2005; Wei, 2004; West, 2007）。特別是 Lee 等人（2011）從政策擴散的觀點來探討影響全球各國電子治理發展程度的研究，補充過去相關研究的缺失，如缺乏大範圍的比較、缺乏國家層級的比較、缺乏完整的解釋架構、缺乏對電子民主的解釋，以及缺乏長時間的觀察等，並提供學界對於電子治理發展相當完整的經驗分析結果。該研究著重在全球各國電子治理的發展程度與何種因素相關？以及何種因素驅動著各國電子治理的發展？

從科技決定論等觀點來看，政府之間資訊政策發展的標準化（standardization）與一致化，似乎又是無可避免的發展途徑（Dunleavy et al., 2003）。換言之，全球各國的電子治理發展將產生政策趨同的現象。然而，若由 Fountain（2001）的觀點來看，由於不同國家在電子化治理的運作與發展，不會單純只由科技效率的角度出發，因為國家內部文化、政治或社會制度配置系絡的差異，會造成各國在思考政府的電子治理時，將產生各自不同的思維，也因而可能導致政策趨異的現象。但究竟目前全球各國電子治理的發展，是趨同抑或趨異？這樣的探索性分析，在目前學術與實務的研究中較為缺乏。同時，針對全球電子治理政策趨同或趨異的初探性研究，也將有助於未來在分析全球不同區域電子治理發展的相關因素時，有關區域異質性深入的探討，瞭解趨同與趨異之間相關因素的差異。

因此，本研究以過去電子治理政策擴散的研究與政策趨同的基礎出發，利用地理資訊系統的空間分析與空間統計功能，針對聯合國（United Nations, UN）2003年與2014年的「全球電子化政府能力調查」（Global E-Government Survey）資料進行分析，嘗試性地探索全球電子治理發展的程度是否可能存有趨同或趨異的現象，以及這些趨同或趨異區域的分布。本研究區分為五個部分：第一部分為前言，闡釋研究動機與目的；第二部分針對電子治理、政策擴散研究與政策趨同的概念進行相關討論；第三部分對本研究採取之實證資料與空間自相關的分析方法進行詳細說明；第四部分為空間自相關的分析結果；最後則為結論。